

榮譽社會科學博士 Dale W. Jorgenson 教授讚辭

一位年輕的經濟學家在一九六三年發表論文，首次勾勒資本和投資成本的原創理念，論證有力，自出機杼，啟迪當時的學人以全新思維，根據過往累積資本模擬未來資產格價。這位經濟學家就是眼前的 Jorgenson 教授。Jorgenson 教授現任美國哈佛大學的莫里斯大學教授。這項在六十年代開天闢地的研究，成為他四十多年來主要經濟理論和實踐的基本主題。至今他發表了逾二百四十篇論文和三十本著作，影響深遠。在二零零一年出版的《放下重擔：稅制改革、資本成本及美國經濟增長》(*Lifting the Burden: Tax Reform, the Cost of Capital, and US Economic Growth*)，建議採納嶄新而成效超卓的入息課稅方法。這稅制將財產收益和工作收入區分，薪俸收入稅徵收 10%，財產收益則徵收 30%，並就商業收益提供稅務優惠，以鼓勵儲蓄及新投資。Jorgenson 教授向美國聯邦政府倡議的稅制，不但為美國政府帶來稅務收益，而且惠及低收入家庭，有助達至社會公平理念。為緩減全球暖化問題，他在一九九七年美國國會聽證會上，更提倡徵收二氧化碳溫室氣體排放稅。

Jorgenson 教授的研究名重遐邇、舉足輕重，其中一項為探索新科技的經濟意義。他在二零零二年出版《資訊年代中的資訊科技》(*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Information Age*)，並在二零零五年與 Mun Ho 及 Kevin Stiroh 出版《資訊科技與美國經濟回復增長》(*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American Growth Resurgence*)，致力量化資訊科技在美國及全球經濟體系帶來的具體影響。他引證了一九八九至二零零四年間，先進經濟體系取得非凡經濟增長，是大幅增加資訊科技設備和軟件的投資成果，而非由於生產力提升。

由於 Jorgenson 教授在多個經濟理論及實踐領域取得重大成果，麻省理工出版社由一九九五年起，為他收集並重新印製合共十冊論文。其中《計量經濟學及資本成本》(*Econometrics and the Cost of Capital*) 在二零零零年由中大現任校長劉遵義教授編訂。十三位傑出門生及研究合作者在此向 Jorgenson 教授致敬，詳述他多年來的研究貢獻。他門下俊彥輩出，其柏克萊及哈佛的門生中，更不乏在全球著名大學擔任講座教授的傑出學人，Jorgenson 教授的理論和研究經由他們的承傳遠播，對當代經濟學產生了深遠影響。

Jorgenson 教授獲獎無數。他在一九七一年獲美國經濟學會頒贈著名的克拉克獎。該獎項每兩年頒授一次，表揚四十歲以下、在經濟研究領域中取得卓越成果的優秀經濟學家。克拉克獎的讚辭讚揚他：「無論對純經濟理論（例如在二元經濟增長的研究）還是統計方法（例如發展理性分佈時差的估計方法），均貢獻良多，交口稱譽。但他最為人稱道的，是將經濟學與統計學兩個範疇加以糅合，應用於解決實際問題。他鍥而不捨地探索投資的決定因素，無論最終結論為何，都是經濟學上理論與實踐結合的最

佳例子。」

Jorgenson 教授獲瑞典烏普薩拉大學(1991)、挪威奧斯陸大學(1991)、日本慶應義塾大學(2003)、德國曼海姆大學(2004)、意大利羅馬大學(2006)及瑞典斯德哥爾摩經濟學院(2007)頒授榮譽博士學位。他屢獲殊榮，包括一九八三年獲美國國際經濟學家榮譽組織 Omicron Delta Epsilon 頒授 John R. Commons Award，一九九四年獲國際能源經濟學家協會頒授傑出貢獻獎，二零零五年獲美國商業經濟協會頒授亞當史密斯獎。他得到多個學術組織頒授院士銜，包括計量經濟學會(1964)、美國統計學會(1965)、美國國家人文與科學院(1969)、行為科學研究中心(1975)、美國國家科學院(1978)、美國科學促進會(1982)、瑞典皇家科學院(1989)、美國哲學會(1998)，並獲美國經濟學會頒授傑出院士銜(2001)。

Jorgenson 教授負重致遠，曾任以下多個重要學術職位：芝加哥大學福特基金會經濟學研究教授(1962-63)、以色列希伯來大學(1967)及美國史丹福大學(1973)的經濟學客座教授、牛津大學統計學客座教授(1968)；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經濟學助理教授(1959-61)、經濟學副教授(1961-63)及經濟學教授(1963-69)。任職哈佛大學期間，出任經濟學教授(1969-80)、阿貝經濟學教授(1980-2002)、甘迺迪政府管理學院科技及經濟政策計劃主任(1984-2005)、陶西格經濟學研究教授(1992-94)、經濟系系主任(1994-97)。自二零零二年起，出任哈佛大學莫理斯大學教授。

Jorgenson 教授為美國經濟學會(2000)及計量經濟學會(1987)前會長。

自二零零五年起，他擔任香港中文大學基金會（美國）董事，鼓勵在美國及其他地區的校友及熱心人士捐助中大，支持大學各項教育及文化活動。多年以來，Jorgenson 教授以其專業知識和真知灼見，慷慨匡扶中大。

Jorgenson 教授是資本成本理論的創始人，其理論被廣泛應用於不同範疇的經濟分析，成就卓越。現謹恭請監督閣下頒授榮譽社會科學博士銜予 Jorgenson 教授。

榮譽社會科學博士鄺廣傑大主教讚辭

馬太福音第十六章記載，耶穌對宗徒彼得說：『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。』鄺廣傑大主教，聖名彼得，擔任牧職四十餘年。在他的領導下，香港聖公會由教區發展成為教省，開創新紀元。他是香港聖公會港澳教區第一位華人主教，也是香港聖公會教省首任大主教和教省主教長。他是教會的柱石，也是社會的棟樑。他以基督博愛的精神，積極參與社會的建設，卓有成就。

鄺大主教一九三六年生於香港。一九六二年從崇基學院畢業，主修中國文學。後赴美深造，一九六五年獲得堅仁大學(Kenyon College)神學學士學位，一九七一年獲得羅切斯特伯思理堂神學院(Bexley Hall, Colgate Rochester)神學碩士學位。他一九六五年在聖公會封職，一九六六年冊封牧師。先後服務於聖公會聖雅各堂、聖保羅堂。一九八一年起出任港澳教區主教。一九九八年，獲選為香港聖公會教省首任大主教。香港教省雖屬普世聖公宗一員，但行政上獨立自治。鄺大主教肩負重責，多所建樹，深受教會內外人士景仰。二零零七年榮休。

鄺大主教在牧區工作時，直接參與傳道牧民的工作，對弱勢社群，尤表關注。他極力幫助清寒子弟入學，轉介有經濟困難的病人就醫。高領白衣底下，原是慈悲聖潔之心，十字聖架之前，更是滿腔慷慨豪情。他晉升大主教之後，日治萬事，統管香港島教區，東九龍教區，西九龍教區，和澳門傳道地區。他並曾任聖公宗—天主教合一與使命國際委員會委員，是會上唯一的亞洲代表，對推動基督教的發展有重大的貢獻。

鄺大主教致力於發展教育事業，曾擔任數拾間學校的校董會主席，長年參與各學校的建設工作。他對香港近年教育發展，頗多感觸。所謂愛之深，責之切。他認為今日辦學機構，往往以市場效應為發展指標。中學看大學，大學看市場。十年樹木，百年樹人。倘若教育學者只顧眼前市場回報，只爭排名榜上的一比高下，我們的下一代會是怎樣的年輕人？這一種負面競爭，將會使到整個社會陷入嚴重的危機。他指出中學應提供全面知識教育，不應過早文理分班，不應撤除歷史學科的教學。他認為整個社會的發展當建基於人文精神之上。教育當以人文學科為核心，培養學生對文化歷史道德的興趣，認識自己，關心世界。科技工商的專業訓練，是建構在人文教育這磐石之上。假如把磐石根基抽離，上面蓋的縱然是七寶樓台，也必然倒塌。

基督教會創立二千年，聖公會遵循傳統，篤守早期使徒無私博愛的精神，深入民間，傳揚福音。鄺大主教說過，『教會需要醒覺，承擔為現實生命工作的角色，把真正的生命帶回社會。』他生于斯，長于斯，對香港有深厚的感情，也對香港社會上各種民生問題，特別關注。他批評強積金計劃，以為在管理層上出現過度商業化的現象，未能真正保障老人福利所需。他堅持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，但是他對同性戀者遭受歧視，深表同情。他對香港市民熱衷於股票買賣，引以為憂。他在教會文告中，屢次提

出他對社會上各種不幸事故或現象的看法，透過勸勉，給群眾帶來新的希望和安慰。

鄺大主教認為宗教與政治並不相悖，政制立法事務，有宗教人士參與，多一分智慧，多一分識見，就更多一分公信力。八十年代，他曾以神職人員身分，參與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和起草委員會，協助把有關宗教信仰條文寫入基本法，以保障宗教。他也曾擔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、和行政長官推選委員會委員等要職。一九九八年起加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，繼續為國家為社會服務。

鄺大主教與香港中文大學淵源甚深。他早年在崇基學院就讀；大學成立以後，在崇基學院任教，主講神學。他是崇基學院的校牧，由一九八一年至一九九零年出任崇基學院校董，二零零七年六月獲委任為榮譽院務委員。鄺大主教熱愛舊日的崇基精神，綠草坡上，禮拜堂前，師生共同研究，彼此學習。他對中大未來的發展，抱有更熱切的期盼。他希望大學能繼續發展人文教育，為社會培養出德智兼備的接棒人才。

鄺大主教清明在躬，仁慈為懷。他一手握著聖經，一手豎起十字架，帶領牧民，邁向甘泉美地。他的敢言，他的風範，深受社會各階層人士敬仰。二零零七年十月，香港政府頒授金紫荊星章，以表揚他對社會的貢獻。鄺大主教在接受勳章時說，『這勳章是屬於所有教會成員，即使不在世的都與有榮焉。』謙謙君子之風，由此可見一斑。鄺主教伉儷，綢繆情深。膝下二女一子，皆學有所成。耶穌登山寶訓說，清心的人、憐恤人的人有福了，因為天國是他們的。鄺大主教為國家為社會，為宗教為正義，擇善固執，彌高彌堅。他享有神的祝福，社會的愛戴，和家庭的福樂，他是有福的。香港能有這樣一位精神領袖，也誠屬有福。謹恭請監督閣下頒授榮譽社會科學博士銜予鄺廣傑大主教。

此讚辭由張洪年教授撰寫

榮譽法學博士董建華博士大紫荊勳賢讚辭

董建華博士於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在上海出生，其父親航運業鉅子董浩雲先生即在日記中寫下這樣的一句：「上帝賜予這一新生命，希望他發揚光大。」董浩雲先生寄望長子在內發揚祖業，遠播家聲；在外服務社會，貢獻國家。倘若他能目睹兒子六十年後肩負重任，獲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首任行政長官，帶領香港順利回歸，落實「一國兩制」、「高度自治」、「港人治港」的理念，一定深感告慰。

上海出生的董建華博士，一九四七年隨父母來港定居。一九五四年唸中學期間，負笈英國；一九六零年在利物浦大學畢業，取得海事工程理學士學位；其後旅居美國；一九六九年返港，協助父親處理家族航運事業。八十年代，全球航運業陷入低潮，但董氏家族集團銳意革新，重整財務，化危為機，鞏固了集團在航運界的領導地位。

董建華博士秉承父志，振興家業之餘，不忘服務社會，身兼多項公職，其中包括行政局議員、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副主席、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及港事顧問。董博士關心香港事務和國家發展，為日後擔任行政長官職務奠下基礎。

「一國兩制」大膽創新，史無前例。董建華博士肩負第一任行政長官的重任，勇於承擔，領導香港特區政府依照基本法施政。回歸後，司法制度在高度自治的大前提下得以保留，普通法繼續適用，市民所享的自由、原有的生活方式均獲保障。回歸以後，香港特區以不同身分積極參與國際事務，與外國簽訂雙邊協定，加入國際組織，出席國際會議，充分發揮國際都會的影響力。不少回歸前適用於香港的多邊條約至今仍獲承認；多個國際組織仍在香港設立重點辦事處。上述各項，均為董博士帶領香港平穩過渡，進入按《基本法》治港新紀元的具體例子。

董博士深知香港的未來繫於兩個因素：面向國際，背靠祖國。故在任期間，一直致力促進香港和內地的經貿合作和本港經濟轉型，創造就業機會。

中國在二零零一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，對外開放進入新的階段，國內經濟發展更形蓬勃。董博士明白，面對新情況，香港如要保持金融中心地位、謀求發展，必須與內地融合，借助內地經濟發展的動力，實行優勢互補，因此與內地簽訂了「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」。這項安排有利於本港服務業向內地市場延伸，也能吸引新興和高增值產業來港落戶，不但鞏固了香港和內地的關係，也為香港的經貿發展指出正確的方向，提供了難得的機遇。今天，香港經濟的穩步增長，實在由董博士在任內促成。

董博士就任行政長官期間，克盡厥職，夙興夜寐，領導政府克服種種困難，積極推行改革，以有效措施紓解民困，尤其重視教育政策，以培養人才。

董博士在上海、香港、英國、美國等地的閱歷和視野，陶鑄其育才樹人、藉教育促進社會平等的理念。董博士更深信，在全球一體化的新時代，缺乏天然資源的香港，要成為國際都會，與世界其他城市競爭，並邁向知識型經濟，不但要有優良的「硬件」，也要有一流的「軟件」——人才。故任內一直視教育為百年大計；即使政府財政緊絀，仍堅持大力投資教育。在香港政府的財政預算中，教育開支一直是最龐大的一項。

董博士就任初期，香港的高中畢業生升學率不足百分之二十，未能配合知識型經濟的需要；政府遂大幅增加大專學額，發展高等教育，使得現在逾百分之六十的香港適齡人口能接受大學或大專教育，升學率與許多發達國家相若。此外，董博士又提倡終身學習，鼓勵港人積極提升知識技能；同時推行等額補助金政策，鼓勵大學尋求社會人士資助，使大學的收入來源趨於多元化，創造了高等教育募款和民間捐貲的新文化。

董博士有感於四年制大學是國際主流，決意投入龐大資源，把現有三年大學學制延長為四年，並改善中學與大專教育的銜接，推動三三四學制改革。對香港中文大學的眾多師生、校友而言，回復行之已久、成效卓著的四年學制，是多年來翹首以盼的大事；現在夙願得償，當年擔任大學監督的董博士居功至偉。以上所舉，僅為董博士任內所播種子中的榮華大者。這些種子，已陸續萌芽成長，未來將成為支撐社會發展的喬木。

董建華博士出生之日正值七七事變。董博士於抗戰時期成長，其時中國百姓備嘗苦難。董博士競選行政長官期間，經常出訪草根階層，結果更能體恤民困；出任行政長官後，強調「以民為本」，對於婦女、老人的權益和福祉，尤其念茲在茲。董博士在施政報告中說：「對弱者的態度，反映了我們這個社會的道德素養。」所以，他的施政處處表現了仁厚之心和恫瘝在抱的胸懷。

二零零五年三月，董博士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，繼續為推動香港及國家事務，為促進中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溝通悉心戮力。

為了表揚董建華博士帶領香港平穩過渡，按《基本法》落實「一國兩制」的偉大構想以及對香港教育的卓越貢獻，謹恭請監督閣下頒授榮譽法學博士銜予董建華博士大紫荊勳賢。

此讚辭由黃國彬教授撰寫

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康本健守先生讚辭

康本健守先生在不惑之年，為拓展家業，首次離開故國日本。背井離鄉的他旋即察覺，不同文化的人，對於工作和生活的態度可以有霄壤之別；繼而領略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的道理，其他文化所孕育的思維方式，均有其可取之處。這段經歷對他影響深遠。跨越文化樊籬，令他無論對於他人還是自身，都有意想不到的了解，因而開始視國際交流為教育的根基。

康本健守先生的歷練與其父親康本龜範先生頗有類同。康本龜範先生生於韓國濟州島一個儒學世家，排行第二，於一九二七年往日本開展新生活。年僅十八歲的康本龜範先生，要克服重重的文化差異及言語阻隔，殊不容易。早年的經歷一直在他心中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記。他在新國度立定根基後，先從事橡膠業，後發展地產企業。堅信「取諸社會，用諸社會」的康本龜範先生，指定將鉅額遺產用於扶掖後進，仁風廣被，奕世流芳。

康本健守先生繼承父業，將地產業務拓展至香港及澳洲，並遵從先翁遺願成立基金 Kamenori Foundation。該基金的宗旨是：「藉著年輕一代的彼此交流，促進日本與亞洲以至大洋洲各國之間的了解與友誼。」該基金一方面贊助亞洲學生到海外交流，另一方面資助日文及日本文化的教育。康本先生的理想，是借鑒西歐和平經濟合作的經驗，以商務合作為先導，進一步加強中日兩國乃至整個亞太地區之間的關係。

康本先生對香港的營商體制及文化讚譽有加，認為香港是國際城市之楷模，不但會成為中國的商業及金融中心，更可在整個東亞穩執牛耳。康本先生的輝煌事業在香港興旺發達，他也奉守父親「取於斯，用於斯」的信念，堅持回饋社會。

香港中文大學高瞻遠矚，致力國際化的抱負，康本先生深表認同，以其與自己的教育理想恰相契合，遂於二零零五年向中大慨贈鉅款，為本校學生提供更多機會參與國際學術及文化交流。「康本國際交流獎學金計劃」為中大歷來規模最大的交流獎學金計劃。過去兩年，已有逾五百名中大同學受惠，負笈全球二十五個國家及地區的著名大學，作為期長達一年的交流。未來，該項計劃將繼續惠澤更多學子。而與之相輔相成的「康本國際學術交流園」，將會成為國際及本地學生會聚、聯繫，分享彼此抱負與夢想的園地。

去年六月，康本先生在「康本國際交流獎學金計劃」成立典禮上訴說心跡，說自己待到四十歲才有機會遊歷四方，故此立志資助後學負笈海外，擴闊視野。他還與大家分享「教育無疆界」的理念，形容國際化是認識不同文化的踏腳石。他說：「國際化的意義，不僅在於了解別人，還在於接納別人；也不僅在於接納別人，還在於了解自己。」

康本先生奉行的管理哲學，是務使自己及僱員都能盡展所長，他的座右銘是：「凡事向正面看。」對於那種事無鉅細，每必親躬，又畏之以威的管理方式，康本先生頗不以為然。反之，他深信營造優良和有推動力的工作環境，在於給予員工自由和自主空間，讓他們各展所長，貫徹企業目標。他就是以這種方式，令員工的幹勁才能得以充分發揮，而員工亦心悅誠服為他效力。

康本先生認為，工作須適得其法，只會埋頭苦幹，不足為訓。如果從事的工作進展未如預期，他會溯本求源，反躬自省，檢討基本原則，尤其反思：「我開展這一業務，所為何事？」重新審視目標，往往能賦予他新的動力，從而另闢蹊徑，解決難題。

在生活方面，康本先生認為起居作息，應該平衡協調。工作之餘，他會安排充足時間與妻兒共聚天倫，並發展個人興趣。雖然他已事業有成，大可退而休之，但他有感於旗下事業，既自己的寄託，也是員工的莫大支柱，故至今仍然努力不懈，耕耘不歇，與員工攜手共進。

康本先生的工作態度、生活哲學及經歷體驗，對我們啟迪良多，能從中了解教育無分疆界，並領會人生最寶貴的歷練，往往來自敢於超越國界。我們更從他身上明白到，教育不圍限於教室，而是終身不輟、持之以恆的過程。

有鑑於傑出企業家康本健守先生，樂善不倦，致力促進國際交流，貢獻卓越，本人謹恭請監督閣下頒授榮譽社會科學博士銜予康本健守先生。